

走出文革連載 11

走出文革

徘徊在生死之間

(接上一期)

當時，我既將女友的信任作為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又極其害怕和擔心女友會離我而去。在我被批鬥的最初幾天，她的父親曾以延安整風時被錯誤批判的戰友為例，要我們相信黨相信群眾，這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馬克思說：“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不幸的是，當無產階級也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政治關係後，不僅是黨和群眾，就連自己最親近的人也不再相信我了。

所幸的是，當她終於在極大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向我宣布“各走各的路”時，我沒有精神崩潰，走上自殺這條路，而是大徹大悟，微笑着面對這場有點滑稽的悲劇，玩世不恭起來。

人在生死之間的心理活動確實是很奇妙的，你會擔心最可怕的事情發生，而一旦它真的發生了，你却又會覺得如釋重負，心中再無牽掛。

感謝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寫了那本曾對我們這一代青年學生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小說：《牛虻》。

當瓊瑪誤解亞瑟背叛革命而“掙脫了他的手，順勢打了他一個耳光”後，亞瑟成了牛虻。

挨了耳光後的亞瑟逃到了南美，在碼頭和甘蔗田裏當苦力謀生。十三年後，當他回到意大利時，瓊瑪見到的是全身骨頭被打碎後重新組裝起來的“牛虻”，那個有點玩世不恭的革命家列瓦雷士先生。

既然挨了女友的耳光，既然幻想中的戰爭不可能，我也忽發奇想逃到南越去參加那裏的抗美戰爭。

當革命群眾忙於對我口誅筆伐時，我却沉浸在逃往南越的“偉大”計劃中，幻想着用我在南越戰場上流出的鮮血去洗刷那些強加在我頭上的罪名，幻想著遍體鱗傷回到中國時，能像列瓦雷士先生一樣去挖苦那些坐在沙龍裏高談闊論的假革命。

當然，要用阿 Q 式的中國語言：“革命？你們還不配……”

我將一切逃亡路上可能有用的東西如小刀、藥、錢和地圖等都悄悄地藏在我的棉被中。

可惜的是毛澤東過早地回到北京，撤走了工作組，我頭上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飛。這完全破壞了我的“戰略部署”，使我的援越計劃胎死腹中。

三十年後，當全班同學在清華園重聚，我再次見到我當年的女友時，她對於三十年前的那件往事似乎有點傷感。

我却覺得不必，就像牛虻臨刑前給瓊瑪的最後一封信中所說：“你大可不必為從前那一記耳光的事情傷心。當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比那沉重的打擊，我受過多次了，而且我都熬過來了，……”

不論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祇快樂的大蒼蠅。

三十年中，每當生死關頭，我都會想起亞瑟和瓊瑪兩小無猜時一起讀過的這首小詩。

新譯《牛虻》已將“快樂的大蒼蠅”改譯為“快樂的飛虻”。這大概更符合英文原義，但我喜歡舊譯，那更俏皮，而且我從未見過飛虻，快樂的大蒼蠅到處都有。

大多數自殺的人都不會像我這樣玩世不恭，而是對人生十分認

真。我的同班同學張懷怡在文革初期自殺而死，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張懷怡學習刻苦，嚴于律己，是中共預備黨員和清華體操隊的骨幹。因為對基層幹部在文革初被批鬥不滿，進而說了一些懷疑林彪的話，他被人告發。1967年3月25日，在清華體育代表隊文革領導小組準備對張懷怡進行大會批鬥前一小時，他乘人不備跳樓自殺。跳樓前他留下遺書，上面寫着：“毛主席我永遠忠于你！！我決不是反革命！！我死後留下的一切都作為黨費。”

他至死都無法理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發動了這場將他逼上絕路的大革命。

他在跳樓前幾天中凝重的神情至今還留在代表隊學生的記憶中，那是他在生死之間徘徊，作着最後的抉擇。

我聞訊趕到跳樓現場後，同代表隊學生周啓博一起用平板三輪車將張懷怡送到校醫院。因傷勢嚴重，校醫院用救護車將他轉送清華大學附近的北醫三院，該院醫生檢查後又建議立即轉送以腦外科著稱的阜外醫院。

據在現場的人說，他在跳下時完成了人生最後一個體操動作，確保腦袋着地。在我將他送往醫院的路上，他或許還有知覺，還試圖將醫生檢查時解開的褲子拉上。他當時已經七竅流血，救護車上的小護士一邊給他擦拭，一邊直掉眼淚。

這最後一個體操動作和拉褲子的動作說明張懷怡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人生依舊那麼認真。

在張懷怡被送入阜外醫院急救室後不到半小時，參加搶救的醫生便走出來宣布他不治身亡。我

很後悔因為缺乏經驗，沒有將他直接送到阜外醫院搶救，但醫生安慰我說，張懷怡的大腦完全撞壞了，即使在跳樓的地方有一座最現代化的醫院也救不了他。

可見張懷怡自殺時下了多大的決心。

張懷怡是他父母的愛子。到北京料理後事的張懷怡哥哥擔心父母經受不住這一打擊，和我們約定在收到他父母的信後，用同學的名義謊稱張懷怡外出串聯了。

兩年後，張懷怡的父母終於知道真相，兩個老人傷心欲絕。

林彪機毀人亡，身敗名裂後，張懷怡的罪名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同學們都已離校，似乎不再有人記得他短暫的一生。但正如魯迅先生在記念被段祺瑞執政府槍殺的劉和珍君時所說：“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

1978年，清華大學黨委為張懷怡平反并向其家屬發放撫恤金和生活補貼費三百元。

呵呵，三百元，人的生命是如此珍貴！

30年後，全班同學和從紐約趕來的周啓博先生一起舉行了一次氣氛凝重的追悼會，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

當求死不能時，人在絕望時還可能精神錯亂。那是以一種生不如死的方式在生死之間作無限期的徘徊。

文革初期我無意中遇到兩個受到迫害或刺激後精神錯亂的女學生。她們的遭遇也是值得人們同情和發人深省的。

大約是在1966年9月前後，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的學生王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榮芬到清華看大字報後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如果你不是大字報中講的那麼壞，希望和你在頤和園十七孔橋銅牛旁見面一談。”信中還約定了時間和手持報紙的見面暗號，署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高洛梅”。

我並沒有收到這封信，因為8月24日紅衛兵血洗清華園後，我已逃離北京。（見：《亡命天涯》）

信落到文革期間負責批鬥我的兩個清華同學手中。在那個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年代，他們顯然是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太緊了，因而如獲至寶，以為發現了我的反革命活動線索，決定假扮我去和這個“天涯淪落人”見面。

但在約定的時間裏，神秘的天涯淪落人並沒有露面，這兩個學生以為受到了我的戲弄。

不料，一星期後又來了第二封信。信中說如果我還能相信她的話，請我在新約定的時間和她見面，地點和暗號照舊。為了掌握我的反革命活動證據，兩人不顧又一次被戲弄的可能，決定再次前去赴約。（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11

南京·東京(九)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這時，羅華握着聽筒，眼淚也

嘩地流了下來，其實她有千言萬語要對劉洪友說。夫妻別離，天各一方，個中滋味，祇有當事人才能體會。

十分鐘的時間轉眼就到了，電話斷了。全家人的年三十越洋電話團聚也宣告結束。

此時，南京城響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聲，夜空中瀰漫着鞭炮燃爆後的火藥氣味，至今還留在羅華記憶裏，每每聞到這種味道，她總會想起那個特殊的年三十。

過了幾天，石川英子通知劉洪友去石神井申辦開書法培訓班的手續。劉洪友喜出望外之餘，還是有點忐忑：自己沒有多少錢，租用教學場地的問題都解決不了，還辦什麼培訓班？難道石川英子

真的沒有辦法？

辦事嚴謹的石川英子早把劉洪友辦學的每個環節都考慮到了，不僅僅是考慮，而且是每個環節都有了明確的落實。日本的公共文化設施比較健全，日本籍公民通過申請可以免費享用。石川英子以自己的名義向當地區役所申請，星期六、星期日下午免費使用石神井女性會館作為書法教學的教室，并已經通過了審批。她又在區役所免費廣告平臺上發布信息，為劉洪友招募學員，結果還真有三人報了名。一位是七十多歲的從日本海上自衛隊退休的鏟水教授，另一位是五十八歲的林業部石卷課長，還有一位是在區衛生所

工作的兒玉先生。石川英子一看人太少了，干脆自己也算一個，有了四個人。四個人還不到“一伍”。“伍”指五個人，是古代軍隊最小的團體，怎麼也得想辦法再去找一個人，湊成“一伍”。于是，她好說歹說，又拉來一位自己的朋友一家裏開空手道會館的七十多歲的大塚夫人，這才湊成了一個人數最少的書法培訓班。

劉洪友想到自己日常對話沒問題了，但是講解書法有許多專業術語，一時半會兒還不能完全掌握。石川英子自告奮勇地說，“我來當翻譯好了。”書法培訓班開班所有的障礙，石川英子都幫劉洪友掃平了。

回宿舍的路上，劉洪友難以抑制高興激動的心情。他禁不住唱起了京劇《沙家浜》胡司令的那幾句唱詞：“想當初，老子的隊伍才開張，攏共才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他現在有五個人，有了這“一伍”，今後還會有“二伍”“三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許要不了幾年，就會把書法培訓班建成書法培訓學校。他越想越美，禁不住心花怒放，走路都覺得要飄起來了。

劉洪友在石神井女子會館的書法培訓班如期開班。劉老師講得認真，石川女士翻譯得精準，學生聽得仔細。這是劉洪友人生邁出的一小步，却是他旅日書法事業中最重要的第一步。

南京·東京(十)

轉機就在絕望前——108枚印章

劉洪友的書法培訓班如期開張，這是石川英子給他的人生點亮的一盞希望之燈，開啓了他在東京通往成功之路的一扇大門。人生有夢想，行動有力量。他除了按時去上語言課，連幹拆地板之類的體力活兒，也開始得心應手，不再覺得繁重了。

一天傍晚，他剛回宿舍，就接到了郵遞員送來的一個紙箱，寄件人是豆子甲水之。這名字好熟？對了，田原老師曾給他寫過信，邵希平老師也寫過。劉洪友迫不及待地打開紙箱，裏面有點心、巧克力、數雙襪子、幾條毛巾，還有牙膏、肥皂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衣物上面有一封沒有封口的信，信裏夾着1萬日元。豆子甲水之先生在

信中說，田先生和邵先生的來信已經收到了，因為年初特別忙，所以信回晚了。

他還說，“在中國我們見過面，應該是認識的。你初到日本，我不知道該怎麼幫你，從信中了解到你會刻印章，我發動自己的門生報名，請你幫他們刻書法作品上的印章，總共有108枚。這麼多印章刻起來要花一段時間，不要急，沒有時間限制，兩三個月完成都可以。”看到後面長達三頁的名單，劉洪友一時有點不相信這是現實。這是真的嗎？我被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砸中了？！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驚喜之餘，他真的很感激豆子甲水之先生用心良苦的幫助。

豆子甲水之住在三重縣鈴鹿市，是東海書道藝術院會長，和著名書法家青山杉雨是同門師兄弟，在日本書道界有較大的影響力。他曾多次到過南京，與林散之、武中奇、尉天池、陳大羽等有較深的

交往。劉洪友記得，他的個子不高，書法水準很高，說話做事實實在在。看豆子甲水之先生寄來的生活日用品、零用錢，以及108枚印章的業務，就知道他的人品，做事細致周到，為人善良，樂於助人。

那時，豆子甲水之並沒有見過劉洪友的篆刻作品，并不知道他的篆刻水平到什麼程度，僅憑田原和邵希平的兩封介紹信，就把108枚印章交給他來刻。

豆子甲水之相信的是田原和邵希平，他倆都在信中評價了劉洪友的書法與篆刻技藝，在豆子先生的人生哲學中，信任比什麼都重要，于是他願意將這108枚印章交給這位初來日本的中國青年藝術家，他相信這位青年能擔此重任。

劉洪友根據信裏的電話號碼，聯系了豆子甲水之，真誠感謝他的雪中送炭。上次刻姥原直義印章的價格是每枚1萬日元，他懷着感激之情給豆子甲水之先生的印章

打了八折，價格是每枚8000日元。豆子甲水之先生爽快地答應了：你說多少就是多少，藝術無價。

說到這段往事，羅華感慨地說：“我後來到日本生活，也體會到，日本對人的幫助，通常不是直接施捨與你，而是考慮到你的自尊心，不動聲色地幫助你。姥原直義也好，豆子甲水之也好，他們都是這樣做的。”

豆子甲水之先生的無私幫助，使劉洪友暗下决心：必須竭盡全力，創作出最好的篆刻藝術精品，才能不辜負日本老師的厚望。

面對如此誘人的“餡餅”，劉洪友想快點吃掉它一不持持久戰，要集中時間和精力打殲滅戰，爭取早日完成這筆大單。這樣一來，那邊拆地板的活兒也要暫時停下，劉洪友跟池野株式會社行動隊請了四天假。語言學校的課程不緊，進度比較慢。劉洪友心裏很清楚，這一陣自己的日語水平上升很快，耽誤

的課程加把勁補一下就能跟得上。

劉洪友把從南京帶來的印石鋪在地上，他打量着這些冰冷的壽山石，心想：要不了多久，我就會賦予你們藝術生命，讓你們都有自己美好的歸宿。

第一道工序，選料。根據日本人名字的字數多少，以及陽文印、陰文印、閑印的不同要求，確定哪枚石頭配給哪個人。第二道工序，打磨石頭。把印面上的油蠟去掉，以便下一步的刻制。

第三道工序，根據石頭的形狀設計印章圖案。劉洪友將印石按在紙上，留下印的邊框痕迹，然後用毛筆將要刻的印章內容設計出來。陰文的印基本是要設計兩稿，有的印章設計需要三遍以上，直到圖案與石頭形狀匹配、美觀和諧才滿意。第四步，雕刻。用刻刀將設計好的圖稿臨到石頭上，完成後試印，有問題的地方還要做最後的修改。（溫婉待續）